

# 全球化时代的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 ——以江陵端午祭为考察中心

吕斌

**【摘要】** 历经两次高强度的全球化冲击，韩国的非物质文化等传统文化在国家、社会的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的积极参与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后开始复兴、蜕变并被有选择地推向世界。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和机遇，韩国形成了“选择性发展个别性”的基本应对模式，亦表现出时间早于东亚其他国家，凸显其非物质文化时代性和国际性等富有特色的“在地”实践。从江陵端午祭的复兴与蜕变看，中国作为相邻各国诸多文化遗产项目的渊源所在，有必要通过完善制度、充分关注其蕴含的有益思想内涵等途径护好本国文化本源；而如何增进文化共识，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制度力量转化为地域统合的促进因素，也亟待深入思考和有效践行。

**【关键词】** 全球化 韩国 非物质文化遗产 江陵端午祭

吕斌，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210093

继“宫廷宗庙祭祀礼乐”（2001）、“板索里史诗说唱”（2003）之后，2005 年，韩国将与中国文化传统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江陵端午祭”申报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Masterpieces of the Oral and Intangible Heritage of Humanity）。这既自然又不自然。较之同列韩国国家重点无形文物名录“游戏与仪式”类别的庆山慈仁端午祭和法圣浦端午祭，江陵端午祭确因技艺保有者、传授教育助教、学习技艺者和参与者较多而颇具代表性。然而在韩国，作为节庆仪式，无论影响范围还是参与人数，江陵端午祭的祭礼活动不仅远逊国家法定假日“秋夕”或“春节”，甚至因端午未能列入国家法定假日而“相对衰落”<sup>[1]</sup>，后来其却成为韩国较早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登录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庆祭礼活动项目。这反映了韩国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全球标准主动考量和能动的一面，也促发了我们的问题意识：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韩国在传统文化领域做出了怎样的应对？

### 一、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既有研究及其视角

关于全球化时代韩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或传统文化，国内外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研究：

第一，有关全球化时代韩国传统文化面临的课题。在这方面，改造传统文化、改善国家形象成为探讨重点。如中国学者庄锡昌指出，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韩国学界认识到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倡导改造传统文化使之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sup>[1]</sup>；韩国海外宣传院院长俞载雄认为，国家形象或品牌等无形资产有助于提高国家或商品的竞争力<sup>[2]</sup>。

第二，有关韩国非物质文化保护及启示。在这方面，国家作用、韩国经验及其与全球标准的关联、韩国非遗保护所面临的问题尤受关注。如韩国亚太无形遗产中心研究调查组组长朴原模论述了韩国非遗的立法、调查和整理，以及在国家复兴中的主导作用<sup>[3]</sup>。韩国学者任敦姬则认为，韩国的非遗保护经验，如 1960 年代建立的非物质文化保护系统、1962 年出台的《文化遗产保护法令》以及申请与传播相结合的完整的遗产体系构建<sup>[4]</sup>，尤其是通过认定“人间国宝”（Living Human Treasures）实现非遗代际传承的体系，是行之有效的，因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借鉴和推介<sup>[5]</sup>。中国学者杨利慧亦认为，韩国非遗保护实践的有效

<sup>[1]</sup>（韩）张长植：《韩国国家节庆假日与传统岁时风俗之变化》，（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2 期。

经验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框架下的全球非遗保护政策起到了形塑作用<sup>[6]</sup>。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部前主任爱川纪子对该观点予以肯定，她指出与中国侧重培训、日本侧重保护方法论研究不同，韩国主动设立的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二类中心（Category 2 Centre）的特点在侧重信息和网络<sup>[7]</sup>。

第三，相关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往往从活动本身、活动功能、社会过程范式三个维度展开。受韩国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及其引发的热议触动，2005年后学界的研究显著增多。韩国学者申英根聚焦江陵端午祭的运营状况，认为政府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措施已然导致传统变容<sup>[8]</sup>。中国学者贺学君指出韩国江陵端午祭与中国端午习俗颇有渊源，但不可混同<sup>[9]</sup>。陈媛、刘畅认为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在于通过祭祀祈求丰收和平安<sup>[10]</sup>。高静则回溯了韩国学界之于江陵端午祭“现实复原—历史包装—原形解构”的认识论转变，描述了国家、学者的端午叙事及其在民间社会的根植过程<sup>[11]</sup>。

上述研究表明，韩国传统文化的存续状况、面临问题与全球化的影响关联紧密，而面对全球化的冲击，韩国在传统文化领域亦有积极应对，从而启发我们从全球化和在地化双向互动的视角进行研究。结合美国一些社会学者提出的“选择”“适应”“抵抗”观点<sup>[12]</sup>，以及小共同体与大共同体相互从属和共处的三种可能状况，笔者认为地方文化应对全球化有如下可能的基本模式：

（1）全面发展个别性；（2）全面放弃个别性；（3）选择性发展个别性；（4）选择性放弃个别性；（5）和谐性融合；（6）对抗性融合；（7）维持个别性现状；（8）维持普遍性现状。

本文将江陵端午祭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因为：一方面，在韩国，它被视为“由来最为长久、规模最为庞大的庆典活动”<sup>[1]</sup>，所蕴含的本土巫俗、源自中国的儒教等传统思想，不仅长期左右韩国历代王朝的政治统治和社会统合，而且对当前社会也有深入影响，从而在传统文化项目中具有代表性；另一方面，在与中国端午节俗渊源深厚以及日本等国亦有端午节令活动的情况下，它以“代表韩国的文物”“显示大韩民国文化特色”<sup>[2]</sup>等定位被援引为全球化浪潮中彰显民族自信的文化表征到底是否成立。

本研究主要基于以下资料：（1）对韩国江陵端午祭进行田野调查收集的资料；（2）就江陵端午祭的原型渊源等问题对韩国的学者进行深度访谈，以及就江陵端午祭的组织运营问题对组委会工作人员、一般民众和日本、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等外国人志愿者或参与者进行深度访谈收集的资料；（3）有关官方统计以及报刊、网络等信息。

## 二、产生与变容：全球化时代的江陵端午祭

16世纪前后，全球化在西方初现端倪之时，东亚也出现了跨国交流的现象。朝鲜王国通过派遣使者学习等路径将近邻中国

<sup>2</sup>[1]庄锡昌：《“全球化”趋势中的韩国传统文化》，（上海）《韩国研究论丛》2002年刊，第151-154页。

[2]（韩）朴宰雨：《全球化形势下韩国国家形象的变化方向——韩国海外宣传院俞载雄院长访谈录》，（北京）《当代韩国》2006年第3期。

[3]（韩）朴原模：《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记录工程与数码档案的构建》，（郑州）《河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

[4]（韩）任敦姬：《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现存人类珍宝的保护：经验与挑战》，白羲译，《百色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5]（韩）任敦姬：《“人间国宝”与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和挑战》，沈燕译，（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6]杨利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历程、经验与挑战：以韩国为视点·主持人语》，（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7]（日）爱川纪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韩国》，沈燕译，（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16年第2期。

[8]（韩）申英根：《地域活性化政策による伝統的祭りの変容と地域社会——大韓民国江原道江陵市の「江陵端午祭」を事例として》，（東京）《地理科学》2009年第2号。

[9]贺学君：《韩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启示——以江陵端午祭为例》，（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6年第1期。

[10]陈媛、刘畅：《韩国江陵端午祭的文化内涵》，（广州）《文化遗产》2015年第3期。

[11]高静：《从原形解构看韩国学术界对江陵端午祭的认识论转变》，（广州）《文化遗产》2016年第3期。

[12]如罗宾·科恩和保罗·肯尼迪认为，“选择”指人们在全球范围内选出中意的事物，使之变为符合地方需求的行为，而“适应”是人们在抵抗或接受全球化过程中通过积累全球化体验增强地方归属感、重视地方的行为，“抵抗”则是担心美国、西欧的全球化文化会使地方传统价值观解体而表现出的反感及抵抗外来文化的行为。参见（美）ロビン・コーエン，ポール・ケネディ（Cohen, R./Kennedy, Paul M.）：《グローバル・ソシオロジー》（Global Sociology），伊藤茂訳，（東京）平凡社2003年版，第63页。

的儒教思想引为治国理念，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都颇为深远，而原先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居主导地位的本土宗教巫俗则逐渐蜕变为民间宗教，作用范围收缩至社会层面。受巫俗自然崇拜信仰影响，江陵地区出现了民间祭祀山神的活动，此被视为江陵端午祭的发端。

关于端午节祭，尽管韩国政府避谈渊源，并将“韩国四大节日之一”“中国和日本也有同样的节日”写入官方表述<sup>[3]</sup>，但其高调推崇的“江陵端午祭千年传承论”“既定事实”却因缺乏资料支撑、历史包装且人为建构印迹浓重，已然受到韩国严谨学者的质疑<sup>[4]</sup>。而“端午节祭源自中国”的观点则受到各国学者不同角度的考证和认同：如从历史学、民俗学的角度，研究《东国岁时记》等韩国典籍的“端午祭”叙事，指出韩国的端午节活动基本因循中国汉朝习俗，包括儒教祭仪在内的端午节祭是“中国的重要节日传入韩国后本土化”的结果；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检视韩国典籍中的“端午节”多以汉字词表述而非其本土固有词，考证韩国端午祭的中国渊源；从地理文化学的角度，研究韩国江原道江陵、襄阳、洞庭湖等地名与中国历史上楚国地名的相似关系，辅以地方民俗记载，推导江陵端午祭等江原道民俗深受当时楚国影响<sup>[5]</sup>；等等。

在上述研究中，被视为江陵端午祭发端的民间祭祀山神活动便被认为颇具楚苗巫俗色彩而与中国渊源甚深。之后，在儒教制度的统合作用和渗入民间的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出于共同体生活的需要，江陵地区祭祀山神的活动演变为包括山神祭祀在内但以祭祀村落神——国师城隍为主的祭祀活动，活动的主导者和组织者为官府，民间则蜕变为参与者。

如果以 18 世纪的工业革命至 20 世纪 60 年代为全球化发端的第一个发展阶段，那么欧美诸国的殖民扩张即为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其间，朝鲜半岛伴随着日本的入侵，经历了一次高强度的全球化冲击。具体说来，19 世纪初至中叶，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维新派应对西方侵略采用的“失之美俄、取之朝清”策略：先是 1869 年提出“征韩论”，后是 1875 年以军舰入侵朝鲜，继而 1910 年将朝鲜拓为殖民地。由于现存史料有限，我们难以全面获知日本 35 年殖民期间江陵端午祭的具体情形，但根据当地“传统文化惨遭抹杀”“一度丧失部分活动”<sup>[1]</sup>的信息，即可想见在主权沦丧的情况下，连同江陵端午祭在内整个朝韩文化遭受了怎样的毁灭性重创。

20 世纪 60 年代，跨国企业的正式登场标志着全球化进入第二阶段。其时正值朝鲜战争停战不久，韩国虽日渐摆脱生存危机，但文化危机意识依然浓厚，克服殖民文化、振兴民族传统仍是题中之义。从 1950 年代成立韩国学会在历史、语言、文学、文化等方面振兴韩国学研究，及至 1960 年代设立文化遗产管理局、颁布《文化财保护法》、确立“无形文物”之提法、实施“人间国宝”制度，再至 1970 年代对全盘接受西方文化的做法加以反省、培育重新审度传统文化价值之思潮，都反映了从国家到社会的全方位努力。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江陵端午祭受到保护和扩改，被列为国家重要无形文化遗产（1967），并在国家层面设立了组织机构——江陵端午祭委员会（1974）。

20 世纪 90 年代，“社会诸关系扩张”“经济、社会惯习相互渗透”“在地化倾向日益明显”<sup>[2]</sup>等现代特征的鲜明呈现，标志着全球化进入第三阶段。此时，韩国已实施地方自治制度：一方面，江陵端午祭等地域文化被征用为提高财政收入、提升地方形象的资源；另一方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展非遗项目和起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过程中，韩国以介绍经验、提供建议等方式，将地方性事物上升为全球标准的组成——不仅其介绍的“人间国宝”（Living Human Treasures）项目被采纳并发展出新的计划，而且其“需将保护范围从口头遗产扩展至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的主张也受到认可并予以实施，从而

<sup>[1]</sup> [2] [3]（韩）江陵市长：《江陵的无形文物》，韩国外国语大学译，江陵市文化观光福祉局 2004 年版，第 18 页，第 8 页，第 18 页。

[4] 参见チャン・ジョンリョン：《韓国の祭祀及び巫俗信仰に関する諸論文の報告書—江陵端午祭と済州島の諸神話—》，李興淑訳，（東京）《古代学研究所紀要》2008 年第 7 号；高静：《从原形解构看韩国学术界对江陵端午祭的认识论转变》，（广州）《文化遗产》2016 年第 3 期。

[5] 参见叶春生：《端午节庆的国际语境》，（北京）《民间文化论坛》2005 年第 3 期；（韩）趙春鎬：《韓國端午祭의特徵》，载中国屈原学会《2007 年楚辞学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韩）チャン・ジョンリョン：《韓国の祭祀及び巫俗信仰に関する諸論文の報告書—江陵端午祭と済州島の諸神話—》，李興淑訳，（東京）《古代学研究所紀要》2008 年第 7 号；杨万娟：《韩国文化与中国楚文化渊源初探》，（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 年第 1 期。

被认为是促使非遗保护实践与理论创新“亚洲转向”的重要动力之一<sup>[3]4</sup>。

不仅如此，在经历又一次高强度的全球化冲击即遭受东南亚经济危机后，韩国实施“文化立国”政策以参与全球化，江陵端午祭被登录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祭祀活动在形式上亦积极配合韩国政府对时代性和国际性特征的强调，成功地转型成集祭礼、展演、游艺和集市为一体的综合性庆典。其组织机构——江陵端午祭委员会则转型为民间机构负责运营，政府出于举办大型庆典的需要有时参与主办。

### 三、复兴与蜕变：国家、社会的协同推进

韩国光复后，江陵端午祭因受到发掘、保护、扩改、征用而复兴，其间国家无处不在，成为活动的保护者、活用者、主办者和资金支持者。

最初，国家为克服殖民文化，动员学者调查地域传统，制定民族文化振兴政策，江陵端午祭被发掘为国家重点无形文物，进而拥有国家设立的举办机构。1980年代后，地方自治体为充盈财政，将江陵端午祭援引为发展观光的文化资本。及至1997年深陷金融危机后，中央政府为摆脱窘境进而提升国际形象，提出了“文化立国”的方针，这与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宣扬地域文化的诉求不谋而合。由此，两者开始协同通过申遗、文化商品出口等方式向世界力推“韩国文化”。

其中，江陵端午祭2000年入选“韩国申请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候补项目，并在“2004年江陵国际观光民俗祭暨国际研讨会”盛大举办后，于2005年申遗成功。此后，围绕端午祭，政府在锻造江陵城市文化，使其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城市合作组织（ICCN）秘书处所在地（2008）的同时，借势打造“面向世界的旅游中心”和国内外“经济中心”<sup>[1]</sup>。

不仅如此，源于惨痛历史境遇的过度民族认同，使韩国在全球层面构建有别于历史境遇的“新气象”的愿望更为迫切，以“争抢”申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式，将江陵端午祭推向世界，既可以在全球抢注韩国之于（江陵）端午祭的法定文化主权，又能表明：较之“也有同样（端午）节日的中国和日本”<sup>[2]</sup>，韩国更好地延承了习俗并使之繁盛，这在某种程度与社会诉求相契合，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协力支持。

江陵端午祭复兴过程中，民间社会亦起到积极作用。作为隶属韩国文化观光部的特别法人，江陵文化院1974年成立后即携下设机构江陵端午祭委员会替代市政府进行主办和运营，通过增设秋千、拔河、投壶等民俗游艺（1979）以及迎神行列（2004）等仪式提高民众的参与，并改变以往仅强调五天主场活动的做法，通过无形文化公演、网络媒体等向国内外宣传推广为期月余的全部活动，促进文化观光商品化。

申遗成功后，江陵端午祭委员会联合江陵端午祭保存会，接受政府财政资助，主办（有时与政府联合主办）和运营活动：一方面，通过掌控乱场（集市）摆摊商户安排、延长摆摊时段以及外放游艺组织权等新型运营方式，力求提高经济收益、组织效率和民众参与度；另一方面，寄望江陵端午祭成为韩国在世界上的形象表征，如对于端午祭（2008）现场派发资料上印制的“希望端午祭成为韩国最好的祝祭，成为韩国在世界上的一个象征”的宣传语句，我们访谈的一位委员会研究员就坦言有此期望。

作为江陵端午祭传统的保有和传承者，无形文物技艺传承人、各类民俗保存会会员等直接参与祭礼或民俗活动。其中包括崔氏——大关岭国师女城隍郑氏女（江陵端午祭祭祀对象之一）的娘家宅院所有者，虽已移居外地，但每年端午返回江陵，所

<sup>4</sup>[1]（韩）江陵市长：《江陵的无形文物》，第72、104页。

[2]（英）デヴィッド・ヘルド（Held, D.）編：《グローバル化とは何か—文化・経済・政治》（A Globalizing World? Culture, Economics, Politics），高嶋正晴（ほか）訳，（京都）法律文化社2002年版，第20-21页。

[3]（日）爱川纪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与韩国》。

举办的家祭被视为江陵端午祭的组成部分。在个人层面，他们或因珍爱家乡文化，或因所保有的传统文化日益为国家重视带来了个人社会地位的提升，从而倍增责任感和自豪感。

在地方或国家层面，面对政府援用无形文化的举措，一部分人认为此事与己无关，只想继承好传统即可。在笔者的田野研究访谈中，崔氏家祭主祭人谈到，不仅自己“只愿延续家祭，不想政府等外力介入”，而且其时正进行巫俗家祭仪式的巫女贫顺爱作为江陵端午祭的技艺传承人，亦“不愿过多介入政府活动”。另一部分人则从文化共享的角度持肯定态度。

如时任官奴假面舞剧保存会会长指出，“从文化共享的角度看，较之单纯保存，加以宣传更为必要”<sup>[3]5</sup>。在世界层面，对于“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江陵端午祭，他们既自豪又希望保持传统，并与世界共享。

江陵地区的一些社会团体在 2006 年江陵端午祭委员会转型为民间机构后受其动员，成为民俗游艺环节的承办者。如 2007 年江陵端午祭的摔跤、拔河、投壶、秋千、江陵方言、四物农乐、掷穀等游艺大会就由江陵青年会、国际狮子俱乐部（Lions Club）第八地区、临瀛文化财保护会、关东扶轮社（Rotary Club）、江原日报社、江陵 MBC 电视台、中央洞开发委员会等负责承办。最初他们虽未必完全出于对民俗项目的兴趣，而多以志愿者的身份参与，但热爱家乡文化并为之自豪的思想情感以及作为志愿者的服务意识成为他们形成高度责任感的动力之源。

当地居民作为江陵端午祭的参与者，往来穿梭于端午祭礼（儒教或巫俗）、展演游艺和乱场（集市）之间。申遗以前，较之祭礼等例行活动，居民对能够满足其端午购物习俗且价格便宜的乱场更感兴趣。2005 年申遗成功以后，在江陵端午祭委员会的策划和动员下，民众参与度日益提升。

如：2006 年“献米酿造神酒”活动的民众献米总量从 2004 年的 8000 公斤增至 10160 公斤；“迎神行列”的参与人数从 2004 年的数十人，增至 2005、2006 年的两千人，直至 2011 年的六千人，其中 2007 年的活动被赋予迎接冬季奥运会的意义，参与者高达万余人<sup>[1][2]</sup>。上述居民从“热衷集市”向“（受组委会号召）献力节祭”的转变，反映了他们以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为契机，在满足日常所需之余，尽可能融入家乡世界级活动的意识转变。

除当地居民以外，来自外地或外国的民俗艺术表演团队、志愿者和观光客亦参与其中。在笔者从事的田野研究的访谈中，参演的日本鸟取市神垣手笠舞保存会表演团成员坦言，这种跨国交流和相互取经对于民俗传承具有积极意义。外国人志愿者大多因精通韩语、通晓当地生活而被分派接待或翻译工作，希望发挥特长促进交流。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后，来自外地或外国的观光客有所增多，其中不乏出于地缘、血缘或兴趣而专程前往之人，但对端午祭文化不甚了解，只因在周边工作或生活，就近或顺道看热闹的亦有不少。

在国家、社会以外，市场对江陵端午祭也有积极的参与，集中体现于乱场（集市）。随着江陵端午祭从祭祀民俗向综合庆典的转型，乱场由自发集市转为庆典活动的一环。最初，乱场不过是江陵居民、商人自发在端午祭场周边摆摊出售蔬菜和日常用品的集市，民俗气息浓郁。1980 年代后，乱场被纳入端午祭，变身为多元市场。

一方面，在当地政府着眼经济收益的“江陵端午祭观光化”过程中，乱场日益受到重视甚至被视为“顶梁柱”<sup>[3]6</sup>；另一方

<sup>5</sup>[1]（韩）江陵市长：《ごあいさつ》，<https://www.gn.go.kr/jap/contents.do?key=2213>，2019 年 8 月 25 日最后登录。

[2]（韩）江陵市长：《江陵的无形文物》，第 18 页。

[3]（韩）申英根：《地域活性化政策による伝統的祭りの変容と地域社会——大韓民国江原道江陵市の「江陵端午祭」を事例として》，（東京）《地理科学》2009 年第 2 号，第 71 页。

<sup>6</sup>[1]（韩）申英根：《地域活性化政策による伝統的祭りの変容と地域社会——大韓民国江原道江陵市の「江陵端午祭」を事例として》，（東京）《地理科学》2009 年第 2 号，第 68-69 页。

[2]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江陵端午祭将于 2 日开幕》，2011 年 6 月 1 日，<https://www.mcst.go.kr/chinese/koreaInfo/news/newsView.jsp?pSeq=604>，2019 年 8 月 20 日最后登录。

[3]（韩）江陵市长：《江陵的无形文物》，第 72、104 页。

面，随着近代化进程中城际移动频仍，外地商人在携入多元特色货品、使组委会收益增多的同时，亦搅扰了原先的集市秩序，摊薄了当地商人的收入，加之遗留的成堆垃圾污染了当地环境，引发当地商人及居民不满。及至 21 世纪，随着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江陵端午祭世界化”政策受到社会支持，以及全球化进程中国际人口移动增多，一些来自巴基斯坦、土耳其、俄罗斯等国的外国人获准成为乱场摊主或打工仔。围绕收益与生活，本地的居民、商人与外地乃至外国的商人既相生相融又矛盾重重。

如此，围绕江陵端午祭等传统文化的抢救、保护与推广，国家对社会进行动员和支撑的同时，亦受到社会的回应和带动，同时市场积极参与其间。在市场、国家、社会的共同影响下，传统文化在蜕变中日渐复兴。

## 四、讨论与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能够发现，一方面，面对全球化高强度冲击下民族（文化）危机以及经济困境的接踵而至，韩国政府在社会协力抢救、复兴传统文化的同时，于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将一批代表性传统文化项目援用为“文化立国”的文化输出资源，表现出“选择性发展个别性”的基本应对模式。另一方面，韩国亦表现出应对全球化的富有特色的“在地”实践：较之同处东亚的其他国家，韩国在文化领域参与全球化更为迅疾，甚至领先于《文化财保护法》出台更早且同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标准制定主要参考对象的日本；同时，与一些国家往往凸显本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和民族性相异，韩国更强调其传统文化的时代性和国际性，不仅将传统文化推向世界，更汇聚传统文化、现代文化一起推向世界。这主要受到以下三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现代化历程。韩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无论是 1910 年后反抗日本殖民，还是 1948 年国家成立后强化政治独裁，抑或 1980 年代总统全民直选制实行后向民主转型，其精力主要在抵抗外力侵蚀、巩固民族独立和维系社会安定方面；直至 1997 年遭受亚洲金融危机重创，才产生援引外力维系国内经济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加之带有后殖民情绪的文化自信，使得其“文化立国”参与全球化的步伐尤为迅猛。较之极易引人回溯其惨淡过往的“历史性”“民族性”，锻造文化输出资源的“时代性”“国际性”特征，更有益于扩大受众，树立国家形象，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国家结构差异。在日本的“市场社会-国家”的纵向结构中，社会民众出于对经济大国生活的满足，主要关注与其生活紧密关联的传统文化项目，从而导致相关保护往往止于国内地方（县、市、町）层面，国家将本土传统文化项目推向世界的政策难获社会即时响应。与此不同，韩国具有“市场-国家-社会”的纵向国家结构，金融危机、社会动荡之时，国家与社会易于就“拯救经济”或“稳定生活”达成共识，在文化领域融入全球化进程更为迅疾。

再次，宗教政策和文化意识。韩国保护和建设蕴含巫俗、儒教等思想的传统文化项目并将其推向世界时，并未违背法律或引起民意的顾虑，但战后日本实行“政教分离”政策，而其许多传统文化都直接或间接与神道有关，导致政府顾忌违反现行法律，在涉及宗教和传统文化的领域谨慎缓行。因此，韩国的传统文化融入全球化进程更显迅猛。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做三点概括：（1）历经两次高强度的全球化冲击，韩国的传统文化在国家和社会的协同推进以及市场的积极参与下，于 1990 年代后全球化时期开始复兴、蜕变并被有选择地推向世界；（2）面对全球化的压力和机遇，韩国形成了“选择性发展个别性”的基本应对模式；（3）韩国在传统文化领域参与全球化的时间早于东亚其他国家，并表现出凸显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性、国际性等富有特色的“在地”实践。

从江陵端午祭等韩国传统文化的复兴与蜕变来看，一方面，在全球化冲击下，韩国民众对于传统文化的珍视与保护，以及传统文化项目不单纯依赖政府扶持而自强自续的实践，对于我国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有参考意义。另一方面，韩国在“选择性发展个别性”的基本应对模式及其“在地”实践下，以关注物质文化为特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复兴”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遮损，一些为谋求认同而不惜遮蔽历史的肆意构建亦令我们警醒：作为历史上包括朝鲜半岛、日本在内的东亚儒教文化圈及东亚地域文明的文化核心，中国是相邻诸国许多文化遗产项目的渊源所在，通过完善保护和申报、充分关注其蕴含的有益思

---

想内涵等方式护好文化本源，是我们的应担之责，否则，被别国抢先注册这种情况还有可能发生。而如何在交流中增进文化共识，将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制度力量转化为地域统合的促进因素，也是亟待深入思考和践行的课题。